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实践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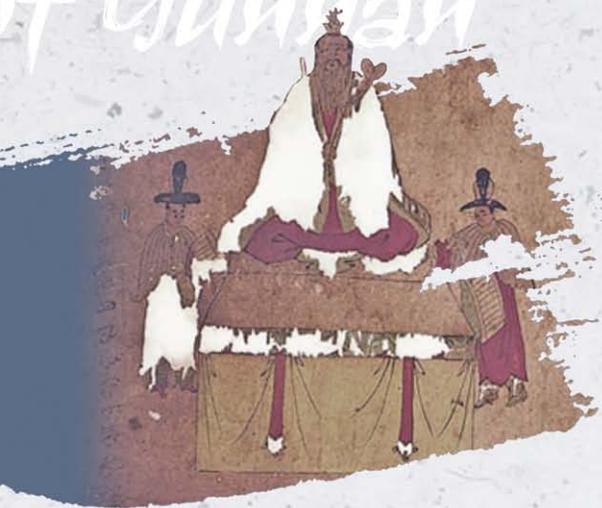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一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一主 编 王四代 张宗红 范 例

彝族毕摩绘画研究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of Yunnan



王四代
颜霁琪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王四代(1955—2016),彝族,教授。原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云南省委副主委、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颜霁琪,男,江西玉山人,1975年12月出生。2009年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艺术理论、艺术人类学等。曾担任中小学教师、《云南日报·大观周刊》责编、《西双版纳报》记者、中国江西网记者等。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实践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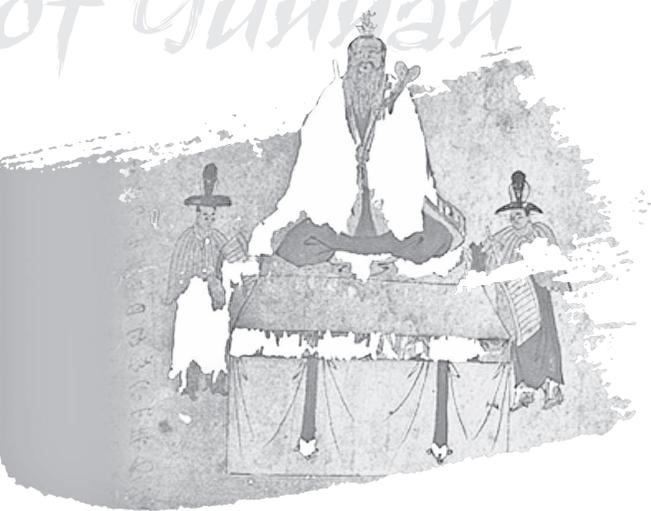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主编 王四代 张宗红 范例

彝族毕摩绘画研究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of Yunnan



王四代
颜霁琪 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毕摩绘画研究 / 王四代, 颜霁琪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
ISBN 978-7-5482-2905-6

I. ①彝… II. ①王… ②颜… III. ①彝族—绘画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J2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749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孙小林 / 装帧设计: 贺涛



彝族毕摩绘画研究

王四代 颜霁琪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905-6

定 价: 30.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 1979 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 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 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 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 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 50 多部，发表论文 300 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6 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40 项，省部级课题 50 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 2300 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 2013 年 7 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侎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学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毕摩绘画的起源与历史变迁	(6)
第一节 毕摩绘画的起源	(6)
第二节 毕摩绘画的历史变迁	(12)
第二章 毕摩绘画的内容与形式	(18)
第一节 毕摩绘画的内容	(18)
第二节 毕摩绘画的形式	(36)
第三章 毕摩绘画中的宗教文化	(45)
第一节 毕摩绘画中的原始宗教	(45)
第二节 毕摩绘画中的佛教文化	(52)
第三节 毕摩绘画中的道教文化	(55)
第四章 毕摩绘画的宗教功能	(62)
第一节 驱鬼、辟邪与禳解	(62)
第二节 占卜、祭祀与祈福	(71)



第三节 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	(76)
第五章 毕摩绘画中的生活图景及宇宙观	(81)
第一节 毕摩绘画中的生活图景	(81)
第二节 万物起源与宇宙观	(91)
参考文献	(99)
后 记	(102)

引言

毕摩绘画是彝族最主要的绘画之一，主要创作者是彝族祭司毕摩们，他们在祭祀、占卜、驱魔除患和图解原始宗教观念等活动时，创作了大量的彝族原始宗教绘画。彝族毕摩绘画多存在于《百乐书》以及一些彝族古籍经书中，反映古代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

毕摩的历史较为久远，彝族古籍里有许多关于毕摩的记载，其发展过程按社会职能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唐、宋以前，其名曰奢老及鬼主，担任彝族酋长，兼任祭司，处于执政的地位；二是明至清初阶段，为酋长的智囊人物和助手，处于佐政的地位；三是清初改土归流以后，一般称为毕摩，专司宗教职事及传播彝族文化。^① 彝族毕摩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一些彝族神话故事甚至认为，先有毕摩，而后有人类始祖，彝族毕摩起源与彝族远古历史密不可分。

彝族古代社会尊重掌握知识的人，认为有知识的人可以管理一切。《天地祖先歌》中记载：古时的人间，知识大无边。有知识的人，他来造天门，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天门他能开，地门他能管。“有知识的人，人间如宝贝；有知识的人，就是神仙根。”谁有知识，谁注重传授知识，谁就受到众人的敬仰。“德乃英”和“布摩柱”两人因传授知识有贡献，结果“人们常纪念，说他俩是神，说他俩是仙”。可贵的是，彝族先民对此也曾有过古朴的认识：人有知识后，用来管宇宙，用来造树林，用来造大地。知识传遍后，一切靠知识，地上的人们，代代更聪明。知识是金门，知识是银门，知识是铜门，知识是铁门。四门一保住，世间永繁荣。^② 《西南彝志》在讲述君、臣、师（即毕摩）的来历时说，毕摩主管祭祀和文化，他们的始祖被称为“布博”，应是原始部落的祭师和文化首领。

① 张德元. 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2, 22 (4): 83-87.

② 陈立浩. 从彝族神话传说看远古社会 [J]. 贵州民族研究, 1985 (2): 82.



图1 毕摩与圣人

毕摩执事时穿毕摩服装，头戴法帽，从毕摩绘画上看，法帽为一种斗笠，彝文古籍《祖神源流》中说：“毕摩是神鹰，头戴鹰爪帽，念经送众神，送走祖先魂。”鹰能在天神与凡人之间沟通联系，可借用为毕摩沟通神灵的中介。毕摩佩戴鹰爪帽，表示对老鹰的崇敬，认为佩戴它能增强驱邪除魔的本领。毕摩的服饰多以青黑色为主，头戴一种特制的斗篷，与帽饰等物相配套。有正式资格的毕摩一般都有一顶法帽。毕摩作法时戴的法帽，是用藤、篾混编而成的顶高约20厘米的双层斗笠（参见图1）。“……用薄木板制成7~9个小鸟状物，间布于中间；下层织成无数六角形花椒眼，或织成7~9个螃蟹状。两侧分别悬挂着一对鹰爪饰带，其长约45厘米。饰带分两部分，上部为黑布制成，绣有彝族传统的花纹，深沉古朴，并缝缀有玉石、银、滑石等制成的饰物；下部为黑丝带。”^①毕摩在祭祖时戴的斗笠上布满用银片剪成的日、月、鸟、蜘蛛等图案。法帽下面的鹰爪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一定的宗教仪式，祭祖灵后成法器。毕摩的“护咒项圈”由一对野猪牙联结制成。毕摩的服饰多以青黑色为主。“毕摩法衣为一种特制的斗篷，与帽饰等物相配套，分羊毛斗篷、丝绸斗篷和棉麻斗篷几种，有黄、红两种颜色。丧事祭祀时穿黄色，婚嫁喜事时穿红色。在祭祖时通常要穿马尾巴披风。马尾巴披风用40匹好马的马尾编织而成，乌黑发亮，为彝族服饰中的精品。在

① 马晓华. 凉山彝族的宗教服饰 [J]. 中国宗教, 2009 (4): 46-48.

一些重大的仪式上，有钱的毕摩还要披银蓑衣，据说具有护佑主人之神力。它由数百片银片穿缀而成。当代的毕摩，在任何场合下做法事，都改穿黑色的棉麻长衫和披上披毡，挎网状经书袋。这种经书袋，彝语称‘海可’，轮廓像毕摩经书中所画的龙，尾部似蛇尾。用两根绳子交错编成，一般由毕摩自己编织。”^① 毕摩已从早期彝族社会的执政者，演变成为专门主持各类宗教祭祀活动的特殊职业者。

毕摩职业的宗教性质决定毕摩绘画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作为毕摩绘画的绘画者和使用者，毕摩也在不断绘制毕摩绘画和使用毕摩绘画，并传授毕摩绘画的使用方法以及绘画技巧，毕摩绘画经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毕摩绘画经书的抄写、装帧、保存和流通有着独特的民族传承惯例，彝族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布面经卷、羊皮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载体的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普安、兴义、盘县等地彝区的水东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毕节、大方、水城、六枝、织金等地彝区的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威宁、赫章等县境内的彝区乌撒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东川、曲靖、昭通等地彝区的滇东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红河、思茅（今普洱）、玉溪、楚雄等地彝区的滇南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昆明、呈贡、晋宁、安宁、富民等地彝族中的滇中毕摩绘画经书；有流传于云南武定、禄劝、寻甸、富民和四川会理等地彝区的毕摩绘画经书。现在遗存的毕摩绘画经书《百乐书》已传承五至八代，明清时期的毕摩绘画属《百乐书》数量众多。毕摩们既是毕摩绘画的保管者，又是毕摩绘画经书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

传抄典籍，在彝族古代教育中是一种普遍的教学方式。“经书传后世，代代学彝文。天文和地理，著书给后人。”^② 彝族通过传抄的方式传播与传承毕摩文化，传承毕摩绘画。《论彝族诗歌·彝族史话》描述了当年彝族文化向外传播的盛况：“在成都城里，那些陀宜人，看了很羡慕，他们用花纸，用黄纸抄下。只塔部落中，也有人羡慕，他们也抄去。本德孟布摩，也来借去抄。天师举奢哲，恒也阿买妮，他俩写得书，经古额布摩，抄了又修订。在那时候的，五位大布摩，都来借去抄。奢哲的诗文，诗文遍天下；阿买妮的诗音，诗音到处传。”^③ 彝文典籍的“传抄”实际上是一种教学活动。“武吉舍为师，传实楚贤文，播乍

① 凉山彝族的宗教服饰 [EB/OL]. 中国宗教网, [2013-03-27]. <http://www.mzb.cn/html/Home/report/386048-1.htm>.

②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M] //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0辑）.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③ 王子尧，翻译. 论彝族诗歌 [M]. 康健，王治新，何积全，整理.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12.



木美史。”^①毕摩负责对“贤文”“美史”的传播。彝族先民把人一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人生在世上，一生学三次，幼年学一次，全靠父母教；成年所知事，要靠君臣教；老年还要学，恒荣呗（恒荣呗：指知识丰富的彝族布摩）来教”。^{②③}这样，三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层次的教育，构成了终身教育的有机整体。

彝族毕摩对学徒的教育在宗教活动中和仪式中进行。教授方法与古代汉族教师教授学生背诵“四书”“五经”颇为类似，即毕摩让“毕惹”学徒背诵经书内容，跟着毕摩诵唱，背熟了让学徒抄写经书。吉克·尔达则伙在他的《我在神鬼之间》一书中回忆其幼年时期学习彝文的经历：“老祭司吉克鸠诺瓦尔教我背诵经文和识字的方法是：一天分为三个时段进行，有不同的要求。晚上一句一句地领念，教我一首一首地背熟，不看文字；清晨督促我狠下工夫背诵记牢；白天教我认真地识字写字。先背熟后再认写，较为便于记住。”^④毕摩教授学徒学习毕摩经书知识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各类仪式的传授是在原始宗教活动过程中进行的。学徒在实际的表演情境中通过自我学习来提升自己的演诵能力。例如神座图插枝技能，插神枝的时候，用多少数量的树枝、需要使用哪些树枝、如何布局等，需根据法事的内容和性质而定，毕摩则让学徒在旁边观看练习。“法事内容有若干，如祭天、祭日月、祭祖先、祭雷、驱邪、送鬼、招魂、超度……各有不同的神枝图。知识渊博的老毕摩祭司大多精于此道，胸有成竹。操作过程中，倘若缺漏细节，必招致鬼神之害。因此，插树枝过程需非常小心谨慎、格外认真，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削皮时不能削反，树叶底面之部位留皮，相对面削皮，插树枝时不得弄反或颠倒，否则认为神灵不能就位，或谓神灵会伤害毕摩祭司；二是木条根部插地，不可将已削过的和顶部插入地；三是阴阳面不得插反，阴朝里阳向外，具体地说，如果自东向西扩张，那么，东面是外即为阳，西面是里即为阴；四是神位秩序不能错，如不能把雷神的位置摆在日、月之位上；五是树枝定数不得随意增减，该用一棵的不得插两棵，反之亦然。小法事插树枝一般不过百，大法事插树枝千余，占地面积相当大，图形和位置变化错综复杂。因此，插树枝成了衡量一个毕摩祭司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在送灵仪式大典中，毕摩祭司聚会，相互竞技，谁插的树枝最准确，大家就推选谁担任毕摩祭司首领，并服从其指挥。由于插树枝在祭仪中至关重要。因此，它成了彝族毕摩祭司

① 贵州省赫章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彝族创世志·艺文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96。

②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指路经（第一集）[C]//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0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③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24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120。

④ 吉克·尔达则伙·我在神鬼之间[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